



唐代僧尼出家的非信仰因素

◎ 吴智勇

【摘要】 唐代僧尼人数增加迅速,造成僧尼出家的非信仰因素不可忽视。总括而言,这些因素有:一、逃避赋役;二、回避政争或逃避制裁;三、遭遇祸乱;四、婚姻变故;五、谋求生计。通过对这些因素的探讨,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佛教在唐代社会中的地位及其所发挥的非宗教功能,也可以看到,佛教对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唐代;僧尼;出家;非信仰因素

【中图分类号】 B9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 (2011) 01-0105-7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不仅藏经规模基本奠定,主要宗派都已形成,僧尼人数也增长很快。据汤用彤先生考证,高宗时期僧尼人数为60,000余人,玄宗时期已达126,100人,而到武宗灭佛时,更多达260,500人。^[1]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不为官府所承认的“良人枝附”者;若二者相加,总数在70万以上。^[2]考察如此庞大的僧尼人口的出家因缘,对于了解唐代佛教发展和社会生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查考各种史料,唐代僧尼出家的因缘,可以概

括为两大类:一是直接相关于佛教信仰的;二是出于社会、政治、经济等非信仰因素的。本文专就第二类非直接相关于宗教信仰的因素论述。

一、逃避赋役

在唐代寺院中,施主拥有所施财产的支配权,而僧尼也可以拥有私产。^[3]作为僧侣、寺院特权之一的免除赋役权,在唐代,虽有逐渐削弱之势,但基本废除,还是很晚的事。^[4]这就产生了世俗之家将财产捐输寺院或本人剃度出家以规避赋役的

〔作者简介〕 吴智勇,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南昌师专讲师,江西 南昌 330029。

社会问题。非因信仰出家，此为大端，它对唐代社会经济和宗教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继武后借佛理革命之後，中宗亦为佞佛之主。

^[5]神龙元年(705)“八月，诏天下试童行经义，挑通无滞者度之为僧。试经度僧从此而始。”^[6]而此试经度僧制度在其实行之初便遭破坏。《资治通鉴》卷二百九，中宗景龙二年(708)：“安乐、长宁公主及皇后妹成国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皆依势用事，请谒受禄……钱三万则度为僧尼。”长此以往，导致“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兼以伪妄；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7]到玄宗朝，便不得不大规模沙汰僧籍。据《旧唐书·姚崇传》，玄宗纳姚崇之言，“令有司隐括僧徒，以伪滥还俗者万二千余人”。^[8]

此一沙汰僧籍之势，不久便被逆转。安史乱中，迫于财政匮乏，军费不足，肃宗于至德二年，采纳御史郑叔清和宰相裴冕的建议，令“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9]结果，“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10]

唐自开元十七年，“敕天下僧尼三岁一造籍”，^[11]开始由朝廷限制僧人的剃度。“元和已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12]而朝廷的诏命并不能禁止地方官巧借名目，广度僧尼以邀利。《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说：敬宗朝，“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人资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时李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奏曰：“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已南，失却六十万丁壮。”^[13]问题之严重，可见一斑。

朝廷虽屡有禁令，私度现象却愈演愈烈。我

们看《大宋僧史略》卷中的一段记载，便可明了：

“(唐)文宗大和四年正月，祠部请天下僧尼冒名非正度者，具名申省，各给省牒，以凭入籍。时入申名者，计七十万。”^[14]这些私度者的主要目的，亦当为逃避赋役。僧尼出家泛滥，严重冲击社会经济秩序。武宗会昌灭佛，固有多种原因，社会资源流失，应是重要的促成因素。

二、回避政争或逃避制裁

武后篡政，为巩固权力，任用酷吏，大兴罗织之风。《资治通鉴》卷二〇五记载说：“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可见政治环境之险恶。这个时代成就了一批酷吏，也造就了奉“摸棱”为要诀，“依阿取容”的宰相苏味道。^[15]在此险境下，不想同流合污，或者说，为求自保的一个做法，就是出家；而出家，也容易得到崇尚佛教的武则天的认可。王守慎即是此例。据《旧唐书·隐逸传》记载：王守慎“垂拱中为监察御史。时罗织事起，守慎舅秋官侍郎张知默推诏狱，奏守慎同知其事，守慎以疾辞，因请为僧。则天初甚怪之；守慎陈情，词理甚高，则天欣然从之，赐号法成。识鉴高雅，为时贤所重。以寿终。”出家後，王守慎名扬缙林，《宋高僧传》卷二六亦为其立传。

王守慎辞官出家，非因祸事逼迫，赢得清誉；而中宗朝杨元琰、玄宗朝裴宽，却直接为政敌构陷，祸在旦夕。为避祸，他们都奏请出家，所幸皆得皇帝信任，不获允。唐末乐彦祯避祸出家则成事实，且带有浓厚的晚唐政治色彩。僖宗年间，乐彦祯据魏博为节度使。其子从训贪暴，“魏人皆恶之”。从训聚亡命之徒五百余人作为亲兵，为魏博镇原有亲兵(牙兵)所忌。魏博自为史思明部将田承嗣所据，养成恶习：节度使之废置皆由牙兵。而从训另置亲兵，牙兵恐有不利，聚众闹事。从训惶惧，逃出魏州城，入相州为刺史。其後，络绎从魏州运出甲兵金帛等物资。“牙兵益疑。彦祯惧，请

避位，居龙兴寺为僧”。^[16]

唐末成汭避仇出家，也是一例：“成汭，淮西人。少年任侠，乘醉杀人，为仇家所捕，因落发为僧，冒姓郭氏。”^[17]此外，唐末乱世中，夫遇害，妻出家避祸之记载，也时有所见：“张格，字承之，故宰相浚之子也。浚为梁祖所忌，潜遣人害于长水。格易姓名，流转入蜀。王建借号，以格为宰相。格所生母，当浚之遇害，潜匿于民间，落发为尼，流浪于函、洛。王建闻之，潜使人迎之入蜀，赐紫，加号慈福大师。”^[18]

遁入空门可以逃避政治或法律制裁，原因首在整个社会出于宗教信仰，对断绝俗缘的僧人所持的尊重与宽宥态度；上举事例可以说明这点。其次，僧团在历史上拥有的某些司法特权，也使人们对出家以避政祸寄寓希望。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教权从未逾越王权，不曾有过宗教庇护下的政治统治“化外之地”。开元十九年四月，玄宗更诏令僧尼在宗教事务之外，均应遵从俗法，“如犯者，先断还俗，仍依法科罪”。^[19]前代流传下来，几经起伏的僧团司法特权，历史性地终结了。这就使出家避祸的希望，在许多时候成了幻想。此举数例，以作说明。

在著名的文宗朝“甘露事变”中，密谋诛杀宦官的李训，事败逃往终南山草堂寺。寺僧宗密与李训有旧，欲剃度以匿之，为从者所止。李训不得已再逃，被擒杀。事为宦官知悉，仇士良遣人逮捕宗密，“责以不告之罪，将杀之。宗密怡然曰：‘贫僧识训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鱼弘志嘉之，奏释其罪。”^[20]

中唐以后政治特点之一是宦官擅政，谋杀宦官等同谋逆；如此大罪，甚至连隐匿未遂的僧人宗密，也受牵连，险遭杀戮，可见欲以剃度逃避诸如谋逆等大罪，是何等渺茫。^[21]我们还可举一例。代宗朝元载事败，妻、子皆赐死。女为资敬寺尼，亦令还俗，没入掖庭。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九说：“族诛者，既诛其壮丁，而妻妾子妇及子孙之幼者，皆没入掖庭为奴婢。”^[22]可见，出家为尼的

身份，并没有为元载之女带来多大护佑。

类似李训之事也出现在骆宾王身上。骆宾王曾辅佐徐敬业讨伐武则天，撰写过著名的《讨武氏檄》。不久，兵败。《旧唐书·骆宾王传》说他“伏诛”，《新唐书·骆宾王传》则说他“亡命，不知所之”，而孟棻《本事诗·征异》则说他出家在钱塘灵隐寺，并与贬谪放还至此的宋之问见过面。^[23]

有意思的是，徐敬业本人也有此传说。《旧唐书·徐敬业传》说他兵败后，“奔至扬州……将入海投高丽”，为追兵所获。《新唐书·徐敬业传》说得更详细，说他“奔润州，潜蒜山下，将入海逃高丽。抵海陵，阻风遗山江中，其将王那相斩之”。《通鉴》亦取此说，并说骆宾王亦为王那相所诛。然而，《太平广记》卷九一引《纪闻》说，徐敬业并没死，为官兵所擒杀者，是他所蓄养的一个“貌类于己”的人。他自己则隐遁到大孤山，“削发为僧”，法名住括。天宝初，年逾九旬的他率弟子来到衡山，告知众僧，自己就是徐敬业，出家后“精勤修道……已证第四果”。死后即葬于此。^[24]《类说》卷一三更引《树萱录》说，李邕曾在南岳天柱寺见到过已出家为僧的他，并说，当年官军追之未获，只斩杀一名貌似者塞责。法师见过李邕，告知实情后即死，“沈拾遗为作碑，不敢正言，乃云徐敬业昆弟”。^[25]

骆宾王出家灵隐寺事流传甚广，今人已考证为“谬误”，不可信。^[26]徐敬业事亦甚可疑，然而，即便是实，也只说明，他是匿身缙林，侥幸逃生，并非剃度后获得免罪特权。不过，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唐人对断绝尘缘的僧人生活的某种想象；也可推知，唐代社会，必有类似事件发生。

三、遭遇祸乱

唐传奇《东城老父传》中的主人公贾昌，原为玄宗朝宫廷斗鸡手。安史乱后，家破失业，虽幸与妻儿重聚，仍“决于道”，出家为僧。似贾昌这般生逢乱世，或因灾变家破落发的僧人，史传材料屡有记载。《宋高僧传》所记载洛阳龙兴寺僧崇

珪事即是一例。崇珪俗姓姜，陕城人。其家世代为官，“自天宝已来，安史之乱，侵败王略，家族迁荡。”父为谋生计，经商于巩、洛间，不幸“亡于逆旅”。少年失怙，崇珪遂依僧寺为沙弥。至十八岁，以“经业蔚通”，得正式剃度。^[27]再如《宋高僧传》卷十所载潭州翠微院僧恒月：恒月俗姓韩，上党人。其父贩盐途中，“俄遇剽略溺死”。父死母改嫁，年幼的恒月“乃决志出家……受教于圣善寺慧初……建中元年，示疾而终，春秋七十九。”^[28]又如《旧五代史·赵凤传》：“赵凤，幽州人也。少为儒。唐天祐中，燕帅刘守光尽率部内丁夫为军伍，而黥其面，为儒者患之。多为僧以避之，凤亦落发至太原。”

《东城老父传》中贾昌出家，有忏悔之意，反映唐人对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的某种思考。而更多遭遇祸乱出家者，为的是生计或避乱。然而，也有出家以全名节者。战乱中，女子被掳，往往失身为奴婢或侍妾，然亦有例外。唐末军阀混战，泰宁节度使朱瑾，原本有功于朱全忠（朱温），约为兄弟。后全忠为夺其地，制造事端，反目成仇。战乱中，瑾妻为全忠所掳，全忠纳之，并告其妻张氏。“（张氏）夫人请见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冤、郗与司空同姓，约为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奴辱于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奴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于佛寺为尼。”^[29]朱温送朱瑾妻出家，就是听从夫人之劝，全其妇节。

四、婚姻变故

婚姻变故，大体分离婚与丧偶两种。在唐代，也有逃婚或维持某种不正常男女关系而导致出家的特殊情形，今并于此叙述。

第一，离婚。唐代男子依古礼，可以“七出”休妻。女方离婚后可以再嫁；不再嫁的，出家是她们的归宿之一。这种出家，多半是“从一而终”的妇节观念使然。据《旧唐书·后妃传下》记载，肃宗李亨为太子时，与宰相李林甫有隙。太子有妃韦氏，其兄韦坚等遭林甫罗织起狱，赐死。太子为稳

固储君之位，上表以“情意不睦”为由，请求离婚，意在撇清与韦家干系。“玄宗抚慰之，听离。妃遂削发被尼服，居禁中佛舍。”这是帝王家事。韦氏遭弃，非因触犯“七出”，而是政治斗争酿成的悲剧。平民家也有类似事件。据范摅《云溪友议》卷中“薛雍氏”条记载，扬州总效雍某，女适崔涯。久之，雍某怒涯之不敬，仗剑令女离婚，为示“不可别醮”，乃使剃度为尼。涯悲泣悔过，且“夫妇甚睦”，而雍某不听。^[30]

唐代婚姻观念比较自由，《唐律疏议》曰：“夫妻义合，义绝则离。违而不离，合得一年徒罪……得罪止在一人，皆坐不肯离者。”^[31]这就给夫妻双方因恩断义绝提出离婚，提供了平等的权力，也就是说，妇女也有权提出离婚。五代即有女性提出提婚而后出家之例。据《资治通鉴》第227卷记载，后唐长兴三年（932），明宗以李赞华为义成节度使，选朝士辅之。“赞华但优游自奉，不豫政事”。中唐以来，藩镇割据，为祸惨烈，或许是见赞华自丧其志，无割据之虞，明宗“嘉之”，并将庄宗后宫之女夏氏嫁与他为妻。赞华残虐，“好饮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仆小过，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夏氏恶之，“奏离婚为尼”。

第二，丧偶。唐代妇女，夫死改嫁现象很常见。而不改嫁者，一部分遁入空门；其原因多种，或纯为信仰，或为守节，或失去寄托，或夫妻感情深挚，也有被迫的。《长安志》卷九“崇德坊”条“西南隅崇圣寺”下注曰：“贞观二十三年（649），徙济度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32]太宗死后，其妃嫔尽度为尼。唐代夫死出家的事例，恐怕没有比这名气更大的；在唐代，似乎也没有第二个帝王死后妃嫔尽数出家。而其中的武才人（则天），出家五年后还俗，再度入宫，奉侍高宗，^[33]更为罕见。

帝王家女儿也有夫死出家之例。唐末天雄军节度留后罗绍威对梁太祖朱温有劝进之功，深得信任。朱温先将其女安阳公主下嫁绍威长子廷规；公主死后，又将另一女金华公主嫁廷规续弦。

廷规卒，朱温“诏金华公主出家为尼，居于宋州元静寺，盖太祖推恩于罗氏，令终其妇节也”。^[34]作为政治婚姻的一个角色，虽贵为帝王之女，无论出嫁、出家，金华公主都无权自决。

李师道妻出家，则是另一类型。元和十四年（819）二月，割据郢、曹等十二州的李师道，兵败被杀，其“妻魏氏及小男并配掖庭”。後魏氏于“元和十五年出家为尼。”^[35]此为罪臣之妻，夫受诛而出家例。魏氏未留掖庭为奴，已是开恩。

上举之例，都有被迫意味，而《朝野僉载》卷三所载卢献女戏剧性的出家，则是出于自愿，且具喜剧色彩：“文昌左丞卢献女第二，先适郑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言辞甚高。姊夫羽林将军李思冲，姊亡之後，奏请续亲，许之。兄弟并不敢白。思冲择日备礼，贽币甚盛，执贽就宅，卢氏拒关，抗声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逾垣至所亲家截发。思冲奏之，敕不夺其志。後为尼，甚精进。”^[36]

丧偶出家的，多为妇女，男子似不多见，但也有。敦煌遗文中有一篇请求捨官出家的状子，略曰：“某捨官出家，并施宅充寺。资财駝马田园等，充为常住。右臣才行无取，叨窃微班。孤单一身，年过六十……冒死上表，志愿出家。”^[37]此文作者名佚，从文中所述，知为一年老鰥居且无子嗣的官员。他不仅本人出家，且捐宅为寺，财产充作常住。我们在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作者内心的悲凉。

第三，逃婚。以出家为代价逃避婚姻，是较为常见的文学题材。上引卢献女出家之事，也可看作此例。而在唐代，有一类特殊婚姻，众多女性避之唯恐不及，性格倔强者，便以出家相抗争；这就是宦官婚姻。据今人杜文玉先生研究，“在唐代宦官家族之间常互通婚姻，故一些宦官养女常以出家为尼以抗拒这种婚姻。宦官仇文义共有六位养女，其中五位均嫁给其他宦官，其第二女看到这种情况，遂‘剃心为缁’，以求清净度日。”^[38]

四、武则天度其男宠为僧，则是较为特殊的例。事见《旧唐书·薛怀义传》：“薛怀义者……以

鬻台货为业，伟形神，有膂力，为市于洛阳，得幸于千金公主侍儿。公主知之”，荐为近侍，“因得召见，恩遇日深。则天欲隐其迹，便于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又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婿薛绍合族，令绍以季父事之。”唐人贞操观念淡薄，女子婚外情现象严重。而贵至诰命，甚至如武则天般身为帝王，与人私通，也不免做些手脚，以障视听。剃度男宠为僧，便其出入宫禁，是武则天使出的不寻常手段。

五、谋求生计

妓女年老色衰，在百无聊赖中，出家以为生计，是她们的归宿之一。杨郇伯《送妓人出家》、杨巨源《观妓人入道二首》、白居易《送筓内人出家》^[39]，都为妓女出家而作，可为例证。^[40]

《唐才子传》“齐己”条说齐己“姓胡氏，早失怙恃，七岁颖悟，为大洩山寺司牧，往往抒思，取竹枝画牛背为小诗。耆夙异之，遂共推挽入戒。”《校笺》引《五代史补》曰：“长沙有大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千馀家。齐己则佃户胡氏之子也。”^[41]陶希圣《唐代经济概说》在谈到寺院庄田的耕作时说：“僧尼自种庄田的实例，是看不见的。僧尼充其量不过是耕种园圃，例外的也作些收集柴草，搬运收获物的工作。不过这些工作也还是由净人、行者、沙弥、以及家人、奴婢来作的多些。”^[42]齐己在出家前是寺院佃户之子，出家後，跻身打杂的净人、行者、沙弥行列。这些人出家，未必没有信仰原因，而必有相当数量的人，是出于生计考虑，齐己似应归于此列。

我们再举贾岛之例，略作分析，以见一类情形。

《唐才子传》卷五“贾岛”条：“初，（岛）连败文场，囊篋空甚，遂为浮屠，名无本。”据此，则贾岛科场屡败在先，生活无着而出家在後。《校笺》引数证後，说：“《才子传》云岛为僧在连败文场後，疑误。”也就是说，贾岛很有可能是出家在先，还俗应进士试在後。不管怎么说，关于贾岛的生平，有三点应无疑问：一、他出身贫寒。苏绛

《贾司仓墓志铭》说：“祖宗官爵顾未研详，中多高蹈不仕。”^[43]比较含蓄地告诉我们，他出身布衣之家。二、出家只是他人生中的一段，无论出家是在参与科举考试之前，还是之后，他最终都还了俗。据《墓志铭》，他卒于蒲州司仓参军任上，有妻无子。三、即便是在出家期间，他也很有可能兼修举子业。所以，我们可以推定，他的出家，未必全由信仰使然，或者说，信仰不是很坚定，却很有可能是出于谋生之需的权宜之计。

在唐代，像贾岛这样的贫寒士子，为生活所迫，依附寺院谋食读书的人，很多。^[44]有些人，甚至不为僧人所容，如《唐摭言》卷七：“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食；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45]连官至宰相的著名诗人李绅，微贱时，也曾在寺院受辱：“（绅）初贫，游无锡惠山寺，累以佛经为文稿，被主藏僧殴打，终身所憾焉。”（《云溪友议》卷一）^[46]他们为求立足，剃度出家，是很自然的选择。也有虽落发，仍无以为生，不得已而亡命为盗的。如唐末李罕之：“李罕之，陈州项城人。父文，世田家。罕之拳勇捷，力兼数人。少学为儒，不成，又落发为僧，以其无赖，所至不容。曾乞食于酸枣县，自旦至晡，无与之者，乃掷钵于地，毁弃僧衣，亡命为盗。”^[47]

综上可知，在唐代，因谋求生计而出家者，不仅有色衰的妓女、失业的佃农，也有贫寒的士子。只是，后者中的一部分人，在条件成熟时，往往脱去僧袍，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比起前两类人，他们有更多的人生选择。

结论

佛教发展到唐代，已为社会广泛接受，与社会各阶层都发生密切联系。以寺院为核心的宗教势力，虽无法与世俗王权相抗衡，却也积聚了一定的力量。这种力量突出表现在经济方面。强大的寺院经济不仅为僧侣修行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也吸

引社会各阶层民众依附它获取生存资源；甚至可以说，寺院在发挥社会保障功能，为失去经济来源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生存保障。其次，僧团独立于社会、王权之外的司法、伦理，以至政治特权虽逐渐被剥夺，但超出尘世的宗教特点使它在臣民与王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中，提供了另外的选择，或者说，成为一种缓冲力量。再次，佛学发展在唐代进入巅峰时期，一大批硕学精进之士投身佛学理论建设，而佛学的包容性，又使它与中国本土之学不断融合；这就使得寺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传播中心，对普通士子产生吸引力。

佛教从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佛教势力也一直处于世俗王权控制之中，相对于世俗社会，佛教是一种疏离力量，但这种力量只能是柔性的，并被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且，在与世俗思想，也就是传统社会思想的碰撞、交流中，佛教被改造，越来越适应世俗社会与王权统治，甚至为世俗社会与王权统治服务。

在对僧尼出家的非信仰因素的考察中，我们也注意到，唐代佛教还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印度佛教的特色。如上述年老妓女出家，可以看作是寺院在安置失去经济能力的社会富余人口，发挥社会保障功能；但是，另一个社会畸零人群，宦官，在王朝倾覆，失去生活来源时，就很难享受到这种“保障”。据《佛说罪恶应报教化地狱经》说，男根不具，乃是前生为恶的“业报”；而《四分律》则明确规定阉人不得“受大戒”。故而有唐一代的宦官，多有虔诚信佛和慷慨布施者，却鲜见出家。^[48]我们在五代史籍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先是，河朔三镇司管钥、备洒扫皆有阉人，（罗）绍威曰：‘此类皆官禁指使，岂人臣家所宜畜也。’因搜获三十馀辈，尽以来献，（梁）太祖嘉之。”^[49]在唐末战乱中，宫人流离，其中的宦官，只能充役于民户，以度残生。

【参考文献】

- [1] 汤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
- [2] 冻国栋. 中国人口史: 第2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108.
- [3] [42] 陶希圣. 唐代寺院经济概说[J]. 食货半月刊, 1937, (4).
- [4] 谢重光. 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393.
- [5] 孙英刚. 长安与荆州之间: 唐中宗与佛教[A]. 荣新江. 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C].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 [6] 觉岸. 释氏稽古略[M].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49册. 822.
- [7] [10] [15] [16] [29] [33] 司马光. 资治通鉴: 第211卷、第266卷、第206卷、第257卷、第261卷、第199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8] [12] [13] [20] [35] 刘昫. 旧唐书: 第96卷、第174卷、第174卷、第169卷、第124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9]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第5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1] 志磐. 佛祖统纪[M].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49册. 374.
- [14] 赞宁. 大宋僧史略[M].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54册. 274.
- [17] [18] [34] [47] [49] 薛居正. 旧五代史: 第17卷、第71卷、第14卷、第15卷、第14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9] [43] 董浩. 全唐文: 第30卷、第763卷[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1] 郭绍林. 唐代士大夫与佛教[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129.
- [22] 赵翼. 廿二史劄记[C].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274.
- [23] 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上册[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7.
- [24] 李昉. 太平广记[C].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604.
- [25] 周勋初. 唐人秩事汇编: 上册[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400.
- [26] [41] 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 第1册、第4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63, 175.
- [27] [28] 赞宁. 宋高僧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214, 237.
- [30] [31] [45] [46] 长孙无忌. 唐律疏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284, 268, 1635, 1268.
- [32] 宋敏求. 长安志: 第9卷[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6] 刘餗、张鷟. 隋唐嘉话·朝野僉载[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58.
- [37] 陈尚君. 全唐文补编: 下册[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579.
- [38] 杜文玉. 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J]. 学术月刊, 2000, (6).
- [39] 彭定求. 全唐诗[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40] 宋德熏. 唐史识小[C]. 台北: 稻香出版社, 2009. 196.
- [44] 严耕望. 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A]. 严耕望史学论文集: 上册[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48] 刘淑芬. 中古宦官与佛教[A]. 刘淑芬. 中古的佛教与社会[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李远国)